新民时论

上海需要发展三种意义的服务经济

诸大建

“上海2040”制定面向全球城市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目的是使我们的城市从外延扩展转向内涵提升。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支柱组成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概念出发,我一直认为上海城市转型的关键问题是发展三种形态的服务经济。即上海城市转型,不仅应该发展基于人工劳动的服务经济,而且应该发展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经济,发展基于生态功能的服务经济。

这样一种广义的服务经济概念,其中经济增长是要提供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社会福利是要提供基于人工劳动的服务,自然保护是要提供基于生态功能的服务。当一个城市能够获得来自物品、人力、自然三个方面均衡的服务的时候,生活品质与发展质量就会大大提高,在世界性的城市战争中具有优势。

一是发展基于人工劳动的服务经济。实际上人对基于产品的物质需求并不是很多的,除了足够的食物、衣服以及头上的屋顶、睡觉的床之外,其他的需求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工服务了。过去十多年,上海主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例如咨询、会计、银行、证券等。对照之下,上海未来要建设成为有顶级竞争力的全球城市,需要有匹配性地加强生活性服务业的比重和质量,包括发展教育、医疗、养老、交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代表的是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社会性服务业代表的是全球城市的地点质量,在上海走向全球城市的进程中,后者对于提高上海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是发展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经济。这是指由产品引申过来的服务经济即欧洲学者提出的产品服务系统概念(PSS即Product Service System)。我们不会为出去旅游度假而买飞机买火车,但可以通过租用、租赁或者共享形式来实现。强调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经济的新意在于:要获得产品的服务,并不一定非要拥有产品不可,而是可以采取租用、借用、第三方支付等多种形式。这对于理解正在崛起的Airbnb、Uber等分享经济有着重要意义。事实上,我们生活中有许多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不需要通过购买和拥有产品来实现,例如社区洗衣房替代私人洗衣机,公共交通服务替代私人汽车出行,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什么都要有的生活”变成“适度拥有的生活”,使生活变得更加轻盈、方便和舒适。深入观察可以体会到,从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的提升,很大程度是由机器与产品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由非拥有的产品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

三是发展基于生态功能的服务经济。与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提供的服务经济相比较,我们还必须关注由资源、环境、生态等自然系统提供的服务。基于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包括了资源供给、环境净化、文化愉悦、生命支撑等能力,很大程度上无法由人工劳动与物质产品所替代。因此,保护足够存量的自然资本以及有效使用它们提供的生态服务,应该越来越多地纳入城市广义服务经济的范畴,成为城市规划、建设、运营的重要内容。这是为什么绿色发展对于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变得如此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可以说,上海2040年建设成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协调的卓越城市,就是要建设成为具有以上三种服务经济功能的全球城市。(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三分钱也要贪?

凌河

已晚谭

腐败有没有“规律”?据说是有的。几个行将退休的官员加紧贪贿,于是就说是“59现象”,日官员越是临近失权,越是心急如焚;接着又有一批上任没几天的新官落马,于是又说有个“80现象”,刚刚当官,一时尝鲜,所以胆大妄为。其实贪官之中,更多的是人到中年、“年富力壮”的人,那又是什么“现象”呢?

还有一个“规律”,大概是公认的,那便是“强力部门”最易出贪官,资源丰厚、权力大,所以容易腐败。这也对,比如发改委的副主任刘铁男,权倾一时,批文、立项、政策、额度,都在他一支笔下,所以连自己也知道,“权力过分集中就会腐败”;发改委能源局煤炭司的副司长魏鹏远,家里就搜出了两个亿,16台点钞机点了一天一夜,还烧坏了4台。又比如证监会的发审委,凡要上市都要求他,所以姚刚这个十多年的“发审皇帝”,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巨贪……这样看起来,“衙门”有没有“油水”,还真成了腐败与否的一条“规律”呢!

但这个“规律”,似乎也被颠覆啦——动物园不是“强力”部门,也没有什么丰厚的资源和“过分集中”的权力吧?但是北京动物园的副园长肖绍祥,不是贪贿了1400万元吗?其中居然还包括本园职工风筝节的补贴一万多元呢,真不知还有没有狮子老虎的口粮在里头哦!一个自来水公司,按说也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热门”官府吧?但是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的总经理马超群,一个副处级的“冷门官”,一抄家,就抄出上亿现金、37公斤黄金,光房产就有68套之多呢!“地质实验测试中心”,是个什么“衙门”,多数人听都没听说过,但是广东省的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副主任郭清宏,不光伙同同僚贪污600万元,光小金库,就达1.68亿元呵……近年来,“清水衙门”屡出贪官,竟至于像扶贫、信访、气象、人防、环保、统计、农林牧副渔这类的“冷板凳”上,都坐出了一批很不干净的“热屁股”。

“清水衙门”如何变出“油水”来?重庆市永川区的“农机补贴腐败案”,足堪一读——农技站应该没有什么“油水”,也不会有多大权力吧?但这个站的站长周忠友,却从小小一个秧盘上榨出了大油水,一张常用的农机具秧盘,国家补贴的2毛5分,农技站先拔一番毛,周站长再剥一层皮,每张秧盘他拿3分钱——可别小看这3分钱、觉得“清水官”可怜呵,几年来,这个周站长与人合谋,仅秧盘一项就虚报188万张骗取补贴46万元,里头就包含着每张3分钱的碎银子呢——其实不光周站长,仅2011年,仅重庆一地,就挖出农机补助领域职务犯罪61人,涉案金额达3396万元!

从“清水”中榨出“油水”来,当然周站长还算小巫,保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李铁柱以下,16人被查处,9人被移送司法机关,道破了“冷衙门”里的“生意经”。“人防”当然是个冷僻单位,不少人还很陌生,但自从“开发”出对民用建筑修建地下工程的审批权后,过去冷清的人防办就成了开发商的“爷”,李主任在人防工程审批中对某项目少批了8500平方米,就笑纳了一套门脸房外加大笔现金,其丧父、娶媳等都成了房地产商孝敬的“节点”,连自己都觉得“火”了,以至于他手下一个小吏,组织上要升她为正县级,她却怕职务变动后不再分管人防工程审批质监验收,断然谢绝了七品乌纱——她是真舍不得貌似寡淡的“清水衙门”里的那几滴油水啊!

事必躬亲

任大刚

结舌者言

在中国,“事必躬亲”是个蝙蝠型词汇,它一会儿被当成褒义词使用,一会儿被当成贬义词使用,到底是“飞禽”还是“走兽”,要看你的着眼点在哪里。

比如近期的新闻报道中,作为褒义词,“事必躬亲”被用于赞扬某地一名号称第一“和事佬”的人民调解员;检查黄河防洪工作;扶贫。被用于贬义词,则包括某地总工会打破“事必躬亲”传统思维定式,巧借社会专业力量提升服务职工水平;某公司CEO事必躬亲,独断专行;还有劝告领导何必“事必躬亲”的,等等。

在表面上,“事必躬亲”是一种工作方式,但如果从韩非子的角度深究开来,恐怕就不是工作方式那么简单。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老百姓纷纷仿效,都穿紫衣服。那时候,五匹素布还抵不上一匹紫布。齐桓公为此忧心忡忡,对管仲说:“如此日甚一日,不能停止,我该怎么办?”

管仲说:“想要制止这种状况,为何不自己不穿紫衣服呢?您就对近侍们说:‘我特别厌恶紫衣服的气味。’如果有近侍恰巧穿紫衣服进见,您一定要说:‘稍微退后一点,我厌恶紫衣服的气味。’”桓公照办了。结果第一天,没有一个侍从官穿紫衣服;第二天,都城中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第三天,齐国境内没有一个穿紫衣服。

这是齐桓公身体力行、制止一种陋习的案例。还有一个故事是有关子产的:

话说子产担任郑国的相国。郑简公对子产说:“我现在喝酒不能尽兴,祭祀器皿不大,各种乐器声音不响亮。我不能专心于国事,使国家不太平,百姓不安宁,种地的和打仗的人互相扯皮,这些过失也有你的份。你有你的职责,我有我的职责,咱们各自管好自己的职责吧。”于是子产经过五年经营,盗贼绝迹,路不拾遗,桃树枣树的果实遮蔽街道也没有人伸手去摘,锥子刀子丢在路上,三天内就有人送回。这种情形三年不曾改变,民众没有再挨饿了。

从工作成效看,可以看出子产主抓的事务实际是很具体的,其中包括以清除盗贼为主的社会治安,厘清物权,搞好农业生产,而不再像之前一样,跟郑简公一起喝大酒,可谓事必躬亲。

但据此认为韩非子赞同事必躬亲,却也失之简单。

宋襄公与楚军作战,因为楚军没有过河,没有摆好阵势,宋襄公拒绝发布作战命令,等到楚军做好准备才开战,结果大败,自己大腿受伤,三天后就死了。

对这个著名故事,韩非子评价说,这就是追求亲自实行仁义带来的祸害。一定要依靠君王亲自去干,然后民众才听从,这就是要君王自己种田吃饭,自己排在队伍里打仗,然后民众才肯从事耕战。这样一来,君王不是太危险了吗?而臣子不是太安全了吗?

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魏昭王想亲自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孟尝君说:“大王想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那么为什么不试着学习法令呢?”昭王才读十几条法令就躺下打瞌睡了。韩非子问,君主不亲自掌握权势,却想做臣子应当做的事情,那么打瞌睡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从以上故事,可以看出,“事必躬亲”这种工作方法,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厘定其性质。韩非子认为,君王的权势须臾不可脱离其手,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干什么都可以,包括“事必躬亲”,如果权势不在手上,“事必躬亲”恐怕是加速灭亡的昏招。

而在今天,如果民意和信息是畅通的,那么是否事必躬亲,就不应该那么截然对立了。

追问洪水:从1998到2016

李泓冰

余烬录

洪水来得猝不及防,三分之一个中国都泡进水中。

看着那些舍命用身体挡住洪潮的年轻面孔,看着他们浑身伤痛,倚着沙包疲惫小憩……心里一阵刺痛,联想到1998年那场同样让中国寝食难安的特大洪水,相似的惊涛拍岸,相似的年轻的脸,相似的举国动员。近20年过去了,当年被九江人民欢送的抗洪子弟兵,现在也是中年大叔了。而今天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当年才呱呱坠地。

洪水初袭时,有人撰文,说汛情严重,但电视镜头封堵决口的,“满眼都是大型机械施工设备,几乎看不见现场人员,没有1998年抗洪时排成长龙扛沙包的战士,更没有子弟兵筑成的人墙,进步是巨大的。”

乐观得略早了一些。

没过几天,人墙、扛沙包、泥水馒头出现了,网上批评声也潮水般涌来——战士吃泥水馒头,是军需供应能力不足?某地领导亲临抗洪前线,图片是否摆拍?人墙沙包是否太原始落后,看德国神器用钢板挡洪水轻而易举,咱怎么不学?三峡大坝不是说能防百年千年一遇洪水?几乎是同步,官方和专家频频出面苦口婆心解释:泥水馒头是战士们没时间下堤享受饮食;带病出征的领导,其镜头只是在拍摄灾情时偶然捎带;所谓挡水神器需要诸多条件比如硬路基,即便发达国家在洪水面前也时常得靠人力运送沙包;百年千年一遇,是指大坝本身过硬到无惧特大洪峰,对中下游暴雨确实作用有限……

舆情纷纭。质疑、感动、悲酸,甚至还有调笑,诸如“湖北只剩湖,找不到北了”之类的段子被疯狂转发,在生死存亡的灾难面前苦中作乐。

20年过去了,是真的没有进步吗?

洪水,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噩梦般相随。几乎每个民族的传说,都有洪水咆哮的巨大魔影。中国远古“水浩洋而不息”始有女娲补天,继之“疏河决江”的大禹治水;西方文明则靠诺亚方舟才从洪水中“重生”……洪水是浩劫,也是砥砺人类文明的利器。一人一家,都不足以对抗天灾,人类学会了集团作战,兴修水利,在越来越复杂的合作模式中,推动制度优化、文明传播和技术进步。

20年,相对于五千年人类抗灾史,只是一瞬。除了物质层面、技术手段,中国更重要的进步,或许就在这追问、解释与反思之中。

改革开放前,抗灾,往往沿袭战争年代的应急动员机制,不太重视对灾难的预防以及灾后的重建,对灾难的反思和诘问更是最大的忌讳。为了避免民众恐慌,政府会对披露灾害信息设限,对因灾死亡人数更守口如瓶。

现在,公众的不懈追问促成了官方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权威媒体逐日更新因灾死亡人数和受灾损失情况已成惯例,对社会上的传言与疑惑,政府也会放低身段出面解释,让民众和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国情,厘清国是,反省国难……

因此,即便公众的追问未必全都妥帖,即便官方的释疑未必全都具有说服力,这仍然是一种进步。我们确实还没有到乐观的时候,外国神器不足恃,有形的大坝不足恃,在依然肆虐的洪水面前,我们都要放低身段,众志成城,在抗灾中继续砥砺技术、制度以及文明的进步……